

清內府刻書檔案史料彙編



清內府刻書檔案史料彙編

上

翁連溪 編

廣陵書社

序 言

章宏偉

馬克思在巨著《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說：“研究必須充分地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①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也說：“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鑽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裏只說空話是無濟於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②馬、恩的論斷是長期科學研究的切身體會，也是對治學方法的深刻總結，是顛撲不破的至理名言。做學問離不開資料，搞史學研究就不能離開史料，不然就是信口雌黃、無稽之談。沒有史料就沒有歷史學。

歷史研究，特別是歷史事實的考證，需要依靠直接而確鑿的論據和科學的論證方法。論證必須以論據為基礎，而可靠的論據是保證科學論證的前提，因而論據必須是直接的、可靠的，而且是準確的。準確的可靠論據才是確鑿的論據，才能做出準確無誤、符合事實的結論，才能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史料是否完備與準確，直接關係到研究成果的大小和好壞。歷史研究只有詳盡地佔有史料，對史料進行具體的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否則，就連一般的研究也無從下手。研究歷史，史料不足，會得不出結論或得出片面的結論；史料不正確，會導致結論的謬誤。史料的範疇非常廣泛，從表現形式來看，古代史料主要包括史跡遺存和文字記錄兩類。史跡遺存可以補充文字記載的不足，可以匡正文獻的謬誤，還能增強人們對歷史的實感性，但史跡遺存也有片斷、局部等局限性，因此在有文字記載的情況下，一般地還必須以歷史文獻為主。在今天，治史者往往更為注

^①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217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

^②恩格斯：《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18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

重文物（實物）與文獻資料的結合。

古代的文獻不是我們今天單一意義上的文字資料，“文獻”一詞最早見於《論語·八佾》：“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①這裏，“文獻”是“文”與“獻”兩個含義的字的組合，“文”指典籍文章，“獻”指古代耆舊先賢的見聞、言論，及他們所熟習的各種禮儀，也包括耆舊先賢的事蹟經歷。宋末元初史學家馬端臨曾以“文獻”二字名其著作為《文獻通考》，他在該書的自序中指出：“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語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②也就是說文獻包括兩大部分，一是文字記載，二是人們的口傳議論。^③

文字記載的形式很豐富，包括歷代經、史、子、集典籍，公私檔案，金石銘文等。用歷史學的眼光看，不只史部諸書是史料，一切史部以外的文獻都含有史料。清人章學誠主張“六經皆史”^④，此說甚是，但仍不足以概括史料的範圍，可以說，舉凡一切文字的記錄，無一不是史料。^⑤

史料以其性質的不同，有種種不同的分類標準。傅斯年先生在《史學方法導論》第四講《史料論略》中對史料種類曾作過精細的區分，分為八類：“直接史料對間接史料”、“官家的記載對民間的記載”、“本國的記載對外國的記載”、“近人的記載對遠人的記載”、“不

①據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第26頁，中華書局，1980年12月第2版，1983年10月北京第7次印刷本。

②〔元〕馬端臨：《文獻通考·自序》，第4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10冊第8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

③但馬端臨“文獻”的含義實際上已經發生了變化，無論是敘事還是論事，它所持的文獻僅包括著文字記載，非文字記載的方面不屬於他所說的文獻範圍。在馬端臨的影響下，關於文獻的認識，便只限於一般的文字記載，不能表達為文字記載的東西，則不能稱之為文獻。

④見〔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一，內篇一·易教上，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第1頁，中華書局，1994年3月。葉瑛、錢鍾書、牟潤孫等先生都指出“六經皆史”這個說法在章學誠之前已有人說過，葉瑛先生據《傳習錄》說此說係自王守仁，特至章氏推闡其義而益精耳。《報孫淵如書》云：“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別，故於天地之間，別為一種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種門戶矣。”（劉刻《章氏遺書》卷九）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中舉出了七位在章氏之前的人說過六經皆史同樣或類似的話，牟潤孫先生在明何良俊《四友齋叢書》中找到一條。分見葉瑛《文史通義校注》，第3-4頁；錢鍾書著《談藝錄》，第263-265頁；中華書局，1984年9月版，1986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本，牟潤孫著《注史齋叢編》，第342頁，中華書局，1987年3月。

⑤胡適《中國書的收集法》說：“從前紹興人章學誠（實齋），他說：‘六經皆史也。’人家當初都不相信他，以為是謬論。用現在的眼光來看這句話，其實還幼稚得很。我們可以說：‘一切的書籍，都是歷史的材料。’”（《胡適文集》第12冊，第46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從史科學的角度看，胡適先生的認識是正確的。類似的觀點，梁啟超先生也曾說過：中國古代遺留下來的可歸入史部的各類文字記錄，“拿歷史家眼光看來，一字一句都藏有極可寶貴的史料。又不獨史部書而已，一切古書，有許多人見為無用者，拿他當歷史讀，都立刻變成有用。章實齋說‘六經皆史’，這句話我原不敢贊成；但從歷史家的立腳點看，說‘六經皆史料’，那便通了。”“也可以說諸子皆史，詩文集皆史，小說皆史”，都“和史部書同一價值”。見梁啟超《治國學的兩條大路》，《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111頁，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1936年版。

經意的記載對經意的記載”、“本事對旁涉”、“直說與隱喻”、“口說的史料對著文的史料”^①。雖然時間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但相關論述似乎還沒有超過傅斯年的概論。在所有的分類中，我以為今天我們應該特別重視一種分類標準，即把史料分為原料（Primary Sources）和次料（Secondary Sources）^②。原料是指最初的材料，由此以上不能再追溯材料的來源。次料是指後起的材料，是由現存的或可尋的原料之中演變化出的著作。次料出於原料，原料為次料所自出。原料或稱第一手史料。追溯論文或專書的根據，我們應力求使用第一手資料。

清人在史料採擇上就已經有比較深入的認識，如顧炎武就極力反對西漢以來那種主觀臆斷的學術方法，非常關注學術研究的材料基礎。他主張目驗，倡導實測，重視第一手材料，而把利用第二手資料比作買銅鑄錢：“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採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銼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③民國年間的主流史學，繼承乾嘉以來的考據傳統，十分重視材料，尤其是第一手材料，使得民國史學的史料範圍得以一再擴大，史料的擴充構成了史學現代化的一部分，在胡適、顧頡剛、沈兼士等人“整理國故”運動的鼓動下，在傅斯年“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號召下，近代史料在從正統到異端、從中心向四裔、從域內向國外、從紙上到地下、從文字到實物幾個方面迅速擴充。因為過分追求第一手資料，還出現了“有二十四史而不看”，專求罕見史料的現象^④。筆記、小說、詩文集、銘刻、檔案甚至過去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的民俗、歌謠等，史家對其的重視程度甚至超過正史官書，其原因就在於前者屬於第一手材料，較少經人有意篡改，因而史實價值更高。史部諸史是有意當作史料而寫的，其寫作的動機包含著一種主觀的目的。這種主觀意識的滲入，會使史實受到程度不同的歪曲，乃至篡改，以致減少了史料的真實性。史部以外的史料，特別是檔案，是第一手資料，是當時事務發生、變化的記錄，並非有意為了保存某種史料而寫，而是無意中保留了或反映出的史料^⑤，因而比較真切，雖然這一類史料中也夾雜、甚至含有比史部諸書更多的主觀意識，但其主觀意識本身就是客觀現實的反映，因而它不但不破壞史料的真實，反而可以從側面反映出更真實的歷史。

①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305-351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

②〔英〕克倫伯（C.G.Crum）在其所著《歷史與歷史研究》（《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search》）一書中建議所有史料應分原料（Primary Sources）與次料（Secondary Sources）兩大類。請參閱陳恭謙著《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第24頁，中華書局，1982年8月。

③〔清〕顧炎武：《與入書十》，遂初堂藏板《亭林集·亭林文集》卷四，第18頁，《續修四庫全書》第1402冊，第10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

④參閱羅志田：《史料的儘量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民國新史學的一個謎論現象》，原刊《歷史研究》2000年第4期，收入《近代中國文學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8月。

⑤戴逸先生在《中華明清珍檔指南·序言》中對檔案的特點曾作過全面而又準確的論述，他指出：“檔案是歷史正在進行過程中形成的各種文字，事後歸檔存儲，以便印證稽查。因此，它是歷史活動的直接記錄。……檔案與學術密不可分，檔案是歷史研究中最重要、最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我國在地面上留存的紙質檔案，時間較早，數量最豐富的應推明清檔案，而尤以清代檔案為數最多。這些檔案時間已久，歷經滄桑，屢經劫難，播遷流散，至今保存尚完好。它是我國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要部分，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文物價值和應用價值。”見秦國經《中華明清珍檔指南》再版本，卷首第1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初版，1999年7月第3次印刷本。

治清史者，非常值得慶幸有清宮檔案可以依憑。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中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人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①自晚清以來，我國各地發現了極其重要的新史料，由此衍生了新的學科群，把我國史學研究推進到了一個新的水準。清宮檔案的發現，被學界譽為 20 世紀學術史上的“四大發現”之一^②，對於其價值、意義，怎麼估價都不為過。清宮檔案是研究清代歷史最重要、最可靠的資料。

清朝歷史檔案是清王朝在政務活動中形成的官文書，被保存下來的特別多，究竟有多少，由於分藏在各種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難以作出精確的統計^③。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一千多萬件，包括有清代內閣大庫檔案、軍機處方略館大庫檔案、國史館檔案、宮中各處以及宮外各衙門和一些私人保存的檔案。這些檔案以文書的種類來劃分，有皇帝的詔令文書，如詔、誥、敕、諭、旨、廷寄、硃諭、電旨等；有臣工的奏章，如中央內閣和軍機大臣勳貴、各部、院、寺、監、署、館、旗以及各省督撫呈上的題奏章疏，彙報各種刑名、錢糧問題的冊、單等；有各衙署來往的文移，如咨、呈、移、劄等；有各衙署的公務記載及彙編存查的檔冊，歷朝編纂成的《起居注》、《實錄》、《方略》、皇室玉牒等等。這些清朝檔案以全宗來劃分，分為七十五個全宗，而尤以清內閣、軍機處、宮中、宗人府、內務府五個全宗的檔案為多，約占一史館全部檔案數量的百分之七十八。這些檔案的內容十分豐富，大凡有關清代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刑名、民族、宗教、文教科舉、農田水利、交通運輸、天文氣象、山川河流、地震荒災以及宮廷生活、皇族事務無不囊括其中，而且都是原始的記錄。這些檔案文件在其形成之初，是用於處理實際事務的，具有很強的原始性，雖然作為行政文書都有很強的時效性，過時即失去效力，特別是在清朝滅亡之後，這些檔案文書就不再具有實踐性，但卻成為歷史資料。這些檔案是當時當事者在實踐活動中直接形成的文件，而非嗣後為某種目的而撰寫的著作或編制的材料，從檔案本身的物質載體來看，無論是皇帝的詔令文書或是臣工的奏章，以及各衙署的來往文書，都有一定的格式，詔書、敕諭、誥命等文書，都蓋有皇帝的玉璽，有的還是皇帝親筆書寫的諭旨或親自批閱的奏摺；臣工的題奏以及各衙門來往文書，都蓋有各衙署的印章和有關官員的簽署。這些

^①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餘錄序》，《金明館叢稿二編》，第 236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 10 月版，1982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本。

^②王國維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中說：“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三則今之殷虛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此四者之一已足當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發見之金石書籍，於學術有大關係者尚不與焉。故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見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靜庵文集續集》，第 65 頁 b，《王國維遺書》第五冊，上海古籍書店據商務印書館 1940 年版影印，1983 年 9 月。

^③請參閱泰國經著《中華明清珍檔指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 11 月初版，1999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本；《明清檔案通覽》編委會編《明清檔案通覽》，中國檔案出版社，2000 年 8 月；莊吉發著《故宮檔案提要》，臺北故宮博物院，1983 年 12 月。

文書在處理過程中所形成的各種歷史標記，確鑿無疑地說明了檔案憑證價值。由於它是原始文件，是制約事物發生、發展和變化的，是其他文書產生的一種條件，較其他史料更為真實可靠，而且這些文件在產生和處理過程中，相互之間形成了緊密的聯繫，不僅一個機關或一個人的檔案具有緊密的聯繫，而且文件相互之間也有多重、緊密的關聯，能直接、系統地反映出歷史的原貌，因而對學術的研究尤其珍貴。儘管現存的有關清代歷史的資料汗牛充棟，但研究清史要放棄這批真正第一手的檔案資料，簡直是不可想像的。這批檔案資料含有極其珍貴的史料，有待於我們的整理，其數量至為龐大，其工作亦至為艱巨。

清王朝在政務活動中，經常需要查閱舊檔和引用成例，因而對各類檔案的管理和使用比較重視，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統治機構都辟有專門的館舍存放檔案，定有比較嚴格的文書歸檔和查閱檔案的制度。以清中央機構而言，屬於各部、院、寺、監的檔案，均在其各自的衙署內設有檔案庫房；屬於上報給皇帝或皇室內府機構本身所形成的檔案，則在紫禁城內專設檔案庫房加以保管。當時設在午門內東側的內閣大庫和設在隆宗門外南面的軍機處方略館大庫等，就是專門存放“大內”檔案的庫房。這些地方所存檔案，在當時均屬於“內府秘笈”，“直九卿翰林部員有終身不得窺見一字者”^①。因此，這些檔案不僅內容一向不為人們所知，而且它們存在的本身，一般的人也都未能知。

清末政治腐敗，財力衰竭，內困外擾，於是發生了大量焚“無用”檔案的事情。內閣大庫因年久失修，光緒三年就已經出現滲漏，內閣多次移催內務府派工修復，均無人理睬。一直拖到光緒二十五年採取了一個“徹底解決的辦法”：“庫內恭存硃批紅本，歷年存積木格已滿，即使再行添置而限於地勢，日久仍不敷用。其庫樓上本章實係有礙工作，非全行挪出開工不易，臣等謹擬通盤詳查，將所有經過多年潮濕霉爛之副本檢出，派員運往空閒之處置爐焚化，以清庫儲，而昭慎重。”^②在得到皇帝的允准後，焚化標準就由霉爛副本而及正本、檔簿。焚燒檔案既已合法，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御史陳璧監察吏部清理檔案事宜時，規定“將實在無用者，悉行焚毀”^③。宣統嗣位後，醇親王載灃攝政“令內閣於大庫檢國初時攝政典禮舊檔，閣臣檢之不得，因奏庫中無用舊檔太多，請焚毀。得旨允行”^④。於是，自宣統元年（1909年）八月初一日開始，逐日檢出。到八月終，共檢出自乾隆至同治朝紅本一萬零六百六十二捆^⑤，露積於庫外擬焚。

①〔清〕阮葵生著：《茶餘客話》卷二，“內閣大庫”條，藝海本，第11頁，《叢書集成新編》第86冊，第3頁，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1月。

②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閣各房各館簿冊》房529號，轉引自王道瑞《簡述清代中央國家機關檔案的損壞與流失》，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檔案與歷史研究》，第125頁，中華書局，1988年5月。本文這段文字敘述，採自王道瑞先生的研究，而不取學界長期沿襲的因內閣大庫發生大規模的牆屋倒塌和滲漏，宣統元年為了修理庫房，遂將庫藏書籍和部分檔案移往內閣大庫對面的文華殿兩廡，軍機大臣管學部事張之洞奏請，將大庫所藏書籍設立學部圖書館，收藏流通，並以舊檔無用，建議焚毀的成說。

③〔清〕朱壽朋編，張靜虛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發實，總4789頁，中華書局，1958年12月版，1984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本。

④羅振玉著：《集蓀編》，第25頁b，《貞松老人遺稿》甲六。羅隨祖先生惠贈該書複印本，謹此致謝。

⑤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閣各房各館簿冊》，房531號。

事有偶然。宣統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學部具奏籌建京師圖書館，“請飭內閣、翰林院將舊刻書籍送部交館儲藏”。奏得皇帝允准後，經商定，內閣“自八月十六日起，逐日開單運赴貴部”^①。學部參事羅振玉被派赴內閣接收書籍，恰好見到在庫垣堆積的未及焚毀的紅本。羅振玉急向管學部事務的大學士張之洞建議，奏罷焚毀之舉，將這些檔案也一併撥歸學部管理。事得允准。^②隨之，內閣“所存同治年間以上紅本均經學部全行運取”^③。

當時移出大內的檔案約計二百多萬件，分別存儲於國子監南學和學部大堂後樓等處。清朝覆亡以後，北洋各派軍閥忙於奪權內戰，漠不關心這些寶藏，內閣大庫的檔案由新成立的教育部所屬歷史博物館籌備處經管，檔案隨之移至午門，但堆積塵封多年，根本未慮及如何妥善保存和整理，更談不到在學術研究及其他方面發揮其作用。司事者把舊檔放置地上，館員數十人“各執一杖，撥取其稍整齊者，餘仍入麻袋”。1921年，歷史博物館以經費困難，除自留一部分較好的檔案外，將其餘部分約八千麻袋、十五萬斤，以四千元之價錢，賣給了西單大街同懋增紙店做造紙原料。一部分流出，事幸為羅振玉得知，慨然以三倍價買回，分藏於天津、北京，並進行整理，印成《史料叢刊初編》十冊。由於人力和財力不支，羅氏又於1924年將大部分檔案以一萬六千元的價格轉賣給前駐日公使、收藏家李盛鐸。1928年，李氏又以一萬八千元的價格將這部分檔案轉賣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至此，這部分檔案已損失了約七分之一，比前重量減少二萬餘斤。這就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八千麻袋檔案事件”。在全國解放前夕，其中的一部分被國民黨政府運往臺灣，其餘的部分到1952年又重回故宮，成為今天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組成部分之一。

清宮內另一項重要檔案，即軍機處方略館大庫內的錄副奏摺，在清朝被推翻後，被北洋政府接收，移出紫禁城，存放在中南海之集靈圃，由於保管不善，遭受了不少破壞和散佚，到1926年又回到故宮，成為今天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存檔案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

清宮內的其他檔案，在1911年辛亥革命後，根據優待清室條件，清遜帝溥儀仍暫居宮禁。原存於宮內的硃批奏摺、諭旨彙編以及軍機處、奏事處、內務府的檔案等，仍為清皇室所佔有，原地存放，無人管理。直到1924年11月4日，馮玉祥驅逐清廢帝溥儀出宮。當時成立了李煜瀛任委員長的清室善後委員會，專門清點管理清宮物品，檔案也是清點的一項。^④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成立^⑤，在其圖書館內設置了文獻部，在故宮外東路錫慶門以南的南三所辦公，以負責集中分散於各處的明清歷史檔案，並著手進行整理和編纂工作。1927年10月，由王士珍任委員長的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將圖書館的文獻

①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閣各房各館簿冊》房40號。

②王國維：《庫書樓記》，《觀堂集林》卷二十三，羅林一，第35-36頁，《王國維遺書》第四冊，上海古籍書店據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影印，1983年9月。

③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閣各房各館簿冊》，房41號。

④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綏裝書局，2004年10月影印。但原書書眉均題《點查故宮物品報告》。

⑤請參閱：劉北記著《故宮滄桑》，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10月；章宏偉《紫禁城：從皇宮到博物院》，《中國民航》2004年第6期；吳瀛著《故宮歷夢錄》，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5月。

部改為掌故部。1928年10月，南京國民政府頒佈《故宮博物院組織法》及《理事會條例》，故宮博物院內部改設秘書、總務二處及古物、圖書、文獻三館。1929年3月，文獻部脫離圖書館，改稱文獻館，成為故宮博物院直屬的三館之一。

文獻館是中國現代第一個最具規模的歷史檔案館，自成立伊始，即具有較濃厚的學術氣氛。該館當年推行的《整理檔案規劃》明確規定：“整理檔案，應保持其原件之形式。”“各種檔案應保持原來之機關面目，即以原來之行政系統為編目系統。”“檔案原來包紮或標識者，不可拆散廢棄。”應該說，這樣的指導思想體現著現代檔案學保存歷史檔案原狀及其完整性的原則，符合對於古代文獻嚴格限制銷毀的原則，也符合審慎對待原有整理基礎的原則。在全體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僅在1925-1937年短短十多年間，文獻館的工作即已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績：一些重要的檔案已初步編目上架；編製出部分目錄以提供利用；已編纂出一些檔案史料以公佈於社會，出版了《文獻叢編》、《史料旬刊》、《清文字獄檔》等刊物或專題史料彙編。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①。

歷史學家陳垣是故宮博物院的常務委員，在文獻館指導業務，對檔案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1929年5月27日他在燕京大學現代文化班的《中國史料急待整理》的講演中就已明確認為，檔案是文字史料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他說：“關於文字記錄方面，我把它們分做兩大類：一是已成書冊的史籍，一是未成書冊的檔案。”^②因為檔案是第一手的原始史料，陳垣對它的重視超過了一般書籍。如在對明末清初宗教史的研究中，陳垣充分評估了檔案的史料價值：“至於歷年教案，自雍正以來，有軍機處舊檔可據。”^③在其史學研究中，陳垣特別重視檔案，大量利用之以研究清代前期諸方面史事，以糾正史籍記載的謬誤、以揭明某些重大史事的歧異迷霧，以查明某些重大歷史疑案的真相^④。陳垣治史一直強調搜集材料，主張竭澤而漁地儘可能將有關專題的材料搜集到手，有第一手材料，絕不用第二手材料。他多年來對學生進行史源學的訓練，即要求學生認真比對史料，追本溯源，找出最原始的來源，藉以辨識出二手三手材料的附加之處和虛妄謬誤之處^⑤。陳垣重視檔案，正因為它是第一手的原始材料。

①關於清宮檔案，請參閱魯迅《說所謂“大內檔案”》、徐中舒《內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檔案的分析》、顧頡剛《高寶學會的清季檔案》、單士元《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所藏檔案的分析》、方楚生《清內閣庫貯舊檔料刊敘錄》、劉子揚、朱金甫、李鵬年《故宮明清檔案概論》、朱金甫《故宮明清檔案部所藏檔案的過去和現在》、單士魁《故宮檔案》等文，均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檔案論文選編》，檔案出版社，1985年8月；單士魁《清代檔案叢談》，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秦國強《中華明清珍檔指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初版，1999年7月第3次印刷本。

②陳垣：《中國史料的整理》，《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二集，第331頁，中華書局，1982年2月。

③陳垣：《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第194頁，中華書局，1980年6月。

④如《疏教王禁約及康熙諭西洋人》、《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敘錄》、《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湯若望與本陳志》、《書于文襄論四庫全書手繫後》、《四庫提要中之周亮工》等，均收入《陳垣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第一集，1980年6月；第二集，1982年2月。

⑤參閱《陳垣史源學雜文》，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

翁連溪先生長期浸淫於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繼承了故宮老一輩學者扎實的治學方法，“不以空論為學問……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也。史料有之，則可因鈎稽有此知識，史料所無，則不敢臆測，亦不敢比附成式。”^①他學術研究的重點在清代內府刻書，不僅對古書手摩目驗，積累了豐富的鑒定經驗，而且特別重視用檔案文獻來印證，編著的《清代內府刻書圖錄》^②填補了以往有關清代內府刻書書目有目無圖的空白；他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等編《清代內府刻書目錄解題》^③基礎上編出的《清代內府刻書總目錄》^④，收錄清代內府刻書七百餘種，是目前收錄最為詳備的清代內府刻書目錄。他對清代內府刻書所做的探討，無論是關於清內府修書機構與體制、清內府出版物的流通，還是清內府書版的刊刻與遺存、對清內府刊刻銅版畫的探討，都用心去搜集材料，大量利用清宮檔案和書版實物，研究做得非常扎實，其中很多地方就得益於這部《清內府刻書檔案史料彙編》資料的搜集，是很值得稱道和學習的。

《清內府刻書檔案史料彙編》是翁連溪先生經多年搜集整理，較為系統地揭示清代內府出版印刷事業的第一手資料。這批檔案資料大都選自清宮舊藏檔案（包括已出版的檔案資料），自康熙朝至光緒朝，如《清內務府武英殿修書檔》^⑤、《活計檔》^⑥、《軍機處錄副奏摺·圖書文教類》^⑦、《奏銷檔》^⑧、《宮中檔康熙朝奏摺》^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⑩、《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⑪、《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⑫、《雍正朝漢文諭旨彙編》^⑬、《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⑭、《宮中檔乾隆朝奏摺》^⑮、《乾隆帝起居注》^⑯、《乾隆朝上諭檔》^⑰、《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⑱、《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⑲、《宮

①傅斯年：《〈史料與文學〉發刊詞》，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335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

②翁連溪編著：《清代內府刻書圖錄》，北京出版社，2004年4月。

③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編：《清代內府刻書目錄解題》，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9月。

④《清代內府刻書總目錄》收入《清代內府刻書圖錄》，北京出版社，2004年4月。

⑤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⑦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⑧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⑨臺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宮中檔康熙朝奏摺》（1-7輯），臺北故宮博物院，1976年6月-9月。

⑩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1-8冊），檔案出版社，1984年5月-1985年5月。

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7月。

⑫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1-40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1991年3月。

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彙編》（1-10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3月。

⑭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詳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黃山書社，1998年12月。

⑮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1-75輯），臺北故宮博物院，1982年6月-1988年7月。

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1-42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11月。

⑰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1-18冊），檔案出版社，1991年6月。

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1-55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11月。

⑲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1-24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

中檔光緒朝奏摺》^①、《光緒朝硃批奏摺》^②、《明清檔案》^③等，同時還輯錄了《盛京皇宮和關外三陵檔案》^④、《清實錄》^⑤、《清會典》^⑥中的相關資料，是瞭解研究清代內府出版印刷事業的寶貴資料。他所做的這項工作，是典依古法，按類抄錄，把自己所需要搜集的史料，從檔案（書）上一條一條地摘錄下來，並在摘錄的每條內容下注明資料的出處、名稱、篇章以及頁數，以備使用時查考。顧炎武的《日知錄》、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陳澧的《東塾讀書記》，都是用這種方法彙編成的巨著。抄錄史料雖然是一種笨拙的功夫，但也有它的宏富精當之處。蘇東坡《答王庠書》說：“卑意欲少年為學者，每讀書皆作數過盡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仿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甚非速化之術。”^⑦翁連溪先生抄錄的清代內府刻書檔案資料，依其史實的先後，以時間為經加以編排，就突出了內府圖書次第發展的過程。缺點是沒有注明每條檔案資料的出處，編者出於統一體例及其他考慮，把每條檔案資料的出處都刪掉了。因是有意為之，在木已成舟的情況下，再推倒重編或把出處重新加上，顯然是不現實的。現在這樣無疑大大削弱了這部《彙編》的價值。好在對於治史者來說，既提供了線索，又迫使你查尋每條需引用資料的出處，或許這是一分為二原理中壞事變好事的辯證法所在。不然，隨便引用很可能為治學埋下隱疾。這也是學術規範要求的一個變例。

清代刻書史、出版印刷史的研究長期以來比較薄弱，而清代出版史實際上有著輝煌的業績。清代究竟刻印出版了多少種圖書，誰都回答不上來。因為我們沒有下功夫去探求。2000年以後，接連出版了幾部巨著，值得研治清代刻書史、出版史者關注。一是李靈年、楊忠先生主編的《清人別集總目》^⑧。這是一部全面反映現存清代詩文別集著述、館藏及其作者傳記資料的大型工具書，共著錄近兩萬名作家所撰約四萬部詩文集。所著錄的別集，皆注明所知的現存各種版本，並儘量保留各館藏書目及卡片提供的有關該書的序跋、題詠、輯鈔、校注、編選、刊印等時間、地點、人名資料，對不同的版本形式，無論是稿本、鈔本，還是刊本（木刻、木活字、石印、鉛印、排印、油印），均不厭其煩，一一加以臚

① 臺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宮中檔光緒朝奏摺》（1-26輯），臺北故宮博物院，1973年6月-1975年7月。

②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1-120輯），中華書局，1996年12月。

③ 張偉仁主編：《明清檔案》（1-290冊，嘉慶朝1-34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年1月-1995年12月。

④ 楊豐楙、佟悅、趙煥林編：《盛京皇宮和關外三陵檔案》，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年7月。

⑤ 《清實錄》（1-60冊），中華書局，1986年11月-1987年7月。

⑥ 《清會典》（1-15冊），中華書局，1991年4月。

⑦ [宋]蘇軾：《答王庠書》，《東坡全集》卷七十六，第24-25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8冊，第232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

⑧ 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

列，對於書目本身提供的輯校箋注刊刻題跋等信息資料，也一併予以保留。這是迄今為止有關清人別集的最為詳備的著作，且不論按圖索驥，繼續深入，能對清人別集出版做出全面研究，即便以該書為依據，哪怕只是做些簡單的統計工作，比如根據《清人別集總目》中明確標注的集子刊刻年份，分別統計到是在哪個皇帝時期刊刻的，也至少能使我們掌握清人文集出版的大致情況。二是王紹曾先生主編的《清史稿藝文志拾遺》^①，凡清人著作見於國內外公私著錄、各種專科性書目、確有刻本、稿本、鈔本流傳而為《清史稿藝文志》、《清史稿藝文志補編》所脫漏者，概行著錄，共著錄清代書籍五萬四千八百八十部。皇皇巨著，堪為淵府。三是柯愈春先生獨力完成的《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②，從方志藝文、公私藏書目錄、清人筆記日記及詩話等書中錄出大量清人別集，並全面調查我國各地圖書館所藏的清人詩文集，注意瞭解港臺及日本、美國等有關圖書館的收藏情況，共收清代有詩文別集傳世者一萬九千七百餘家，四萬餘種。這三部下死功夫做出來的目錄學巨著，猶如一座座屹立的豐碑，堪為治刻書史、出版史研究的榜樣。

在清代出版史上，有一個課題是非常值得去研究，而且能做得非常厚重，即是連溪兄已下了不少功夫的清代內府刻書。我多次與連溪兄聚談，做清代內府刻書研究，不僅有實物圖書大量存世，當時刊刻的書板尚有存在^③，又有不少當事者或耳聞目見者的記述可以印證，更主要的是數以萬計的原始檔案留存，甚至有的相關專題的檔案原原本本一件都沒有缺失，這對於我們復原清代內府刻書歷史，是其他課題所無法企及的優越條件。現在圖書出版史的研究太過粗疏，少有人下功夫做資料搜集彙編工作。在涉及清代文化政策、編書刻書方面，值得稱道的只有《清代文字獄檔》^④、《纂修四庫全書檔案》^⑤等幾種，而且在研究上也明顯的功夫不足，類似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⑥那樣引用資料翔實，並有新的開拓的論著少而又少，一些相對來說屬於基本的問題，都尚缺乏深入的研究，比如眾人評說清代的文字獄對學術文化造成了浩劫，但究竟有多慘烈，影響多深，卻始終缺少一種量化的分析；對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幾乎衆口一詞，總是不期然地完全歸功於總纂官紀昀，甚至將《提要》的思想傾向與水準歸結等同於紀昀的思想傾向與水準；研

①王紹曾主編：《清史稿藝文志拾遺》，中華書局，2000年9月。

②柯愈春著：《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2月。

③儘管火災使宮中書板損失嚴重，如《清穆宗實錄》記載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二十日晚，西華門內武英殿不成於火，延燒至三十餘間……”，武英殿修書處所藏書籍、書板、印刷工具等慘遭毀滅，但估計尚遺存清宮書板20萬塊（面）。請參閱翁連溪編著《清代內府刻書圖錄》附一“清代內府刻書概述”之“四、清內府書板的刊刻與遺存”，第19-28頁，北京出版社，2004年4月。

④原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清代文字獄檔》，上海書店，1986年5月，“清代歷史資料叢刊”本，根據原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1931年至1934年版複印。

⑤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

⑥黃愛平著：《四庫全書纂修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1月。

究晚清的官書局，幾乎還沒有人到檔案中查尋史料^①。如此等等，足見研究有待深入。

在清代內府刻書中，武英殿刻書無疑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武英殿刻書由於皇帝的重視，以皇家的力量，聚集了一流的人才，而且有嚴格的制度，從事者也勤謹認真，更有強大的財力物力支持，因而刻書品質是非常高的。我們在《四庫全書》纂修過程中刊刻、其後廣為流傳的《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中能夠非常清楚地看到。又如殿版《二十四史》，“大部分依據明監本和汲古閣本，當時擔任編校的許多人又很有幾個切實的學者在內，它實在不是一種草率完成的本子。我們想，只要排除好古家和校勘家的偏見，對於殿本誰都會感到相當滿意的。”^②自19世紀80年代石印用於翻印古籍，到動議組織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之前的1926年，連同排印，殿版《二十四史》被翻印不少於23次，幾十年已充滿讀者書架，影印殿版《二十四史》已很難賣了，1919年商務印書館就以特價發售1916年印的存貨。張元濟先生為了商業經營的目的，要在聲勢上打倒殿本，抬高“百衲本”的價值，以求擴大《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發行，在宣傳上就作了比較多批評殿本的文字^③，嚴重地影響了人們對於殿本的認識。要扭轉類似這樣有意或無意形成的偏見，只能依靠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又如清代的滿文出版，在內府出版史上就有著十分重要的位置^④。“清文”作為有清一代的“國語”，有著無比榮耀的地位。清文出版在清代各朝都得到了應有的重視，特別是在清前期，在乾隆朝達到鼎盛，內府僅刻滿文書就多達數百種，這還不包括被乾隆視為與《四庫全書》同等重要的《清文翻譯全藏經》。《清文翻譯全藏經》至晚在乾隆三十六年就已開始編譯，直到乾隆五十九年刻印完成，歷時20多年^⑤。但

①講官書局，幾乎沒有人到檔案中查尋史料。此說不錯，但不夠（在那兒不能細談，一談就又鬧了）。閣下進了宮後，言必檔案。這當然對的，但研究歷史有檔案、材料是不夠的，必須將這些回到歷史環境中，才能認清，才能寫好。那天在府上在去就發路上，你提到官書局時，我說有些說官書局，離開了清代的制度在談。譬如左宗棠曾在軍中刻過書，有人就說那是官書局，而不從刻書多元化考慮。一度凡“書局”前有地名的都是官書局。魏隱儒將直隸書局說成是官書局。我翻過魯迅日記，民初他在北京時，日記中多次出現去“直隸官書局”。共有次數記不起了，但在前的一半寫“官書局”，後來的一半寫“書局”。那是民國年間。在清代，我說過，涉及機構必須報皇上，查不到奏摺是不能算的。其次，如果直隸總督真想辦個書局，他也是不能設在琉璃廠的，——從《畿輔通志》上，北京雖屬直隸，但直隸總督是不能管的。以上引自汪家焯致章宏偉信，2005年6月1日。

②葉聖陶：《〈二十五史〉刊行緣起》，《葉聖陶序跋集》，第156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12月。

③汪家焯：《〈百衲本二十四史·史記〉真相——讀〈史記校勘記〉兼與王紹曾教授商榷》，未刊稿。

④章宏偉：《清代滿文出版研究》，第四屆國際滿學暨赫圖阿拉建城400周年學術研討會，撫順，2003年8月；《從滿文創制到滿文出版的濶跡——清代滿文出版研究之一》，中國民族古文字學會第七次學術研討會，北京，2004年10月；《從滿文創制到滿文出版傳播的濶跡》，《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清代前期的滿文教育與滿文出版》，第八屆清宮史學術討論會，北京，2006年9月。

⑤書名是認識一部書的起點。滿文《大藏經》的書名一直是因繞學界的一大問題。由於學者們沒有看到清代文獻中對這部藏經書名的記述，更由於該書沒有書名頁，其卷端、修書職銜前、目錄前都沒有書名，因而現在學者們（包括見過和沒有見過這部藏經的學者）往往指稱該“大藏經”為“滿文《大藏經》”、“《滿文大藏經》”。“滿文《大藏經》”只是揭示該藏是滿文，“《滿文大藏經》”是新擬的書名，與書序名稱及書名著錄原則均不符；也有學者稱這部藏經為《清文全藏經》（筆者以前就是這樣稱呼這部藏經的），但也只是新擬的簡稱而已。根據古籍書名著錄原則，首先是卷端題名，其次書名頁，再者封面上的書簽題名，再序跋文、目錄、書口。在這部大藏經的卷首，有乾隆帝所撰序文《清文翻譯全藏經序》，完全可以據此給這部滿文藏經定名——《清文翻譯全藏經》。而且，在乾隆時期的文獻中就有明確的《清文翻譯

對於這樣重要的《清文翻譯全藏經》，研究顯然是極為不足的。連溪先生也是大陸研究《清文翻譯全藏經》最早的學者之一^①，作出了較大的貢獻。對於清內府出版，需要多方面的人才通力合作；在語言方面，不僅需要精通滿語，還需要精通蒙語、藏語等語言；在出版物內容方面，佛經又不是人們平常經常接觸的經史子集，而佛經的數量又十分豐富，僅清代刻印的《大藏經》，就有漢文的《龍藏》、滿文的《清文翻譯全藏經》、蒙文的《甘珠爾》、《丹珠爾》、藏文的《甘珠爾》、《丹珠爾》。因而，研究的空間十分巨大。

我對於清代內府刻書少有研究，沒有資格來議論評點。因為來故宮後與連溪兄比較投緣，又有不少共同語言，這次連溪兄的大著行將出版之際，囑我寫序，自是無由推託。雖說是班門弄斧，愚者之見或有一得。我希望自己在不久的將來，能與連溪兄一起來共同開拓清代內府刻書的研究。我一直希望自己能結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內務府活計檔、奏銷檔和武英殿檔案等的整理，以俾完全復原武英殿刻書的全貌。待這些工作做後，再讓我來談清代的內府刻書，或許能夠說到點子上，說得更實在些。

顧頡剛先生曾說：“我們不做學問則已，如其要做學問，便應當從最小的地方做起。研究的工作仿佛是堆土阜，要高度愈加增先要使得底層的容積愈擴大”，“只有一粒一粒地播種，一簣一簣地畚土，把自己看作一個農夫或土工而勤慎將事，才是我的本分的事業。”^②願以此與連溪兄共勉。

全藏經》的稱謂：“乾隆五十五年，命以《清文翻譯全藏經》成，皇上親製序文中訓。”在全文引錄《御製清文翻譯全藏經序》後，“臣等謹案：佛書以有全藏，不與經史並列。我皇上精究法乘，以為梵文雖異，其義則同，亦既三譯成編，番、漢、蒙古字體具備，則國語譯經之舉，所關固有甚巨者焉。仰惟皇上以長壽無量之身，康強繁世，慶登八旬，而茲所譯全藏經文通以本年告厥，是不可思議之因緣。皆由善思議之福智有以快如願而暗圓成信，非偶然也。恭譯序文，推本於上天之默佑，示安於中外之尊親，要皆以循理之為廣大同之化然，則文思廣被，至德難名，彼三竺之秘典，且將與《四庫》之鴻篇同垂不朽，豈非億載昌期之盛事乎哉！”（〔清〕阿桂等纂修：《八旬萬壽盛典》卷十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60冊，第177-178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說的就是這部滿文藏經之事。據此內外證，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為這部滿文藏經正名。請參看章宏偉：《〈清文翻譯全藏經〉研究五題》，《故宮博物院80華誕暨國際清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11月。

① 翁連溪：《滿文〈大藏經〉的譯刻》，《紫禁城》1993年第1期；《乾隆滿文〈大藏經〉譯刻》，《清代宮史叢談》，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10月；《乾隆版滿文〈大藏經〉刊刻述略》，《故宮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6期；《滿文〈大藏經〉中的插圖版畫》，《紫禁城》2001年第4期。

② 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一冊）《自序》，第3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月影印本。

凡 例

一、本書係有清一代內府纂修刷印出版官書的檔案史料彙編，新輯檔案史料分為上下兩編，上編是按編年體輯錄的檔案史料，起自順治六年正月初八日至宣統年間，下編亦按簿冊奏摺時間編次的檔案史料，最末一件是民國二十四年後的。

二、本書新輯檔案史料原件藏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及國家圖書館及已出版的綜合性檔案史料。

三、本書上編新輯檔案史料均按具文時間先後編次。上編以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年號及年月日為序，檔案史料有年號及年月而無具體日期者排在該月之末，有年號及年而無月日者排在該年末，僅有年號而無年月日者排在該年號末。無具文時間則以硃批時間列入並加示之。下編簿冊亦以年號及年月日為序，因簿冊與奏摺兩件分離，本身又未具時間，只好將以排在相應處。

四、本書新輯檔案史料上編以具奏摺時間或以硃批時間為題，下編則以簿冊內容重新擬題。在編輯時編者為檔案史料進行了文字加工除加有“、”“，”“；”“：”“。”標點及“《》”書名號，官員官銜間加“·”區隔。亦將新輯檔案史料格式原抬寫格式取消而進行重新分段。

五、本書新輯檔案史料，凡文末有皇帝批語者均在批語前加硃批二字，並另起行排。字行間有皇帝批語者亦在字前加硃批二字，並置於“()”內。

六、本書新輯檔案史料原文發表，原文中漏字漏句處酌上下文加於“()”內，原文明顯示訛錯加以改正之字於“()”內，原文有殘缺字處用□□□代之，為原文大篇殘缺則以〈上殘〉、〈中殘〉、〈下殘〉示之，原文有刪節之處用(上略)、(中略)、(下略)示之。

目 錄

001頁 —— 序言

001頁 —— 凡例

上 編

003頁 —— 順治年

003頁 —— 康熙年

093頁 —— 雍正年

103頁 —— 乾隆年

418頁 —— 嘉慶年

488頁 —— 道光年

503頁 —— 咸豐年

526頁 —— 同治年

549頁 —— 光緒年

下 編

619頁 —— 武英殿鑄刻匾額戶部顏料價值則例

621頁 —— 武英殿修書處刷印圖書匠役工價銀兩清冊

625頁 —— 道光二十五年俄羅斯進呈書目存理藩院

636頁 —— 武英殿辦理道光帝《聖訓》錢糧清冊

650頁 —— 武英殿修書處刷印圖書匠役工價銀兩清冊

664頁 —— 武英殿修書處寫刻刷印工價並顏料紙張定例清冊

679頁 —— 武英殿辦理同治帝《聖訓》錢糧清冊

689頁 —— 清同治光緒年間武英殿賣書底簿

722頁 —— 武英殿修書處報銷檔案

738頁 —— 頒發武英殿通行書籍目錄清冊

752頁 —— 《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實錄庫東庫藏案及圖書目錄

799頁 —— 參考文獻

805頁 —— 整理者後記

清內府刻書檔案史料彙編

上 編